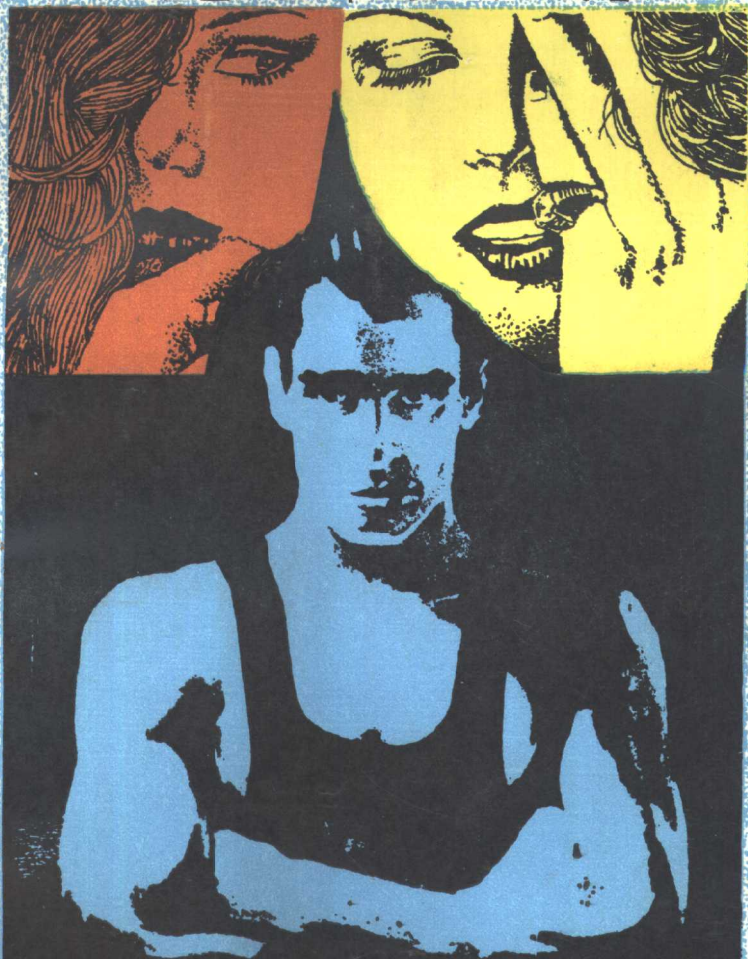


〔乌拉圭〕胡·卡·奥内蒂 等著



球星在情网中死去

湖南人民出版社

I782.4
1
2

球星在情网中死去



043433



女子学院 0061081

球星在情网中死去

(乌拉圭) 胡·卡·奥内蒂等 著

李明德 刘文波等 译

责任编辑: 译敏 霞蔚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46000 印数: 1—21800

ISBN 7—217—00304—0

I·123 定价: 2.45元

湘人: 87—12

目 录

1. 球星在情网中死去

.....〔乌拉圭〕胡·卡·奥内蒂著 (1)

李德明 刘文波译

2. 宝石与火石

.....〔秘鲁〕何·马·阿尔盖达斯著 (73)

赵振江译

3. 地 道

.....〔阿根廷〕埃·萨瓦托著 (131)

丁文林 赵德明译

4. 支 部

.....〔智利〕路·恩·德拉诺著 (249)

郭冰肌译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1909年生于乌拉圭，是拉美当代名作家之一，被尊称为拉丁美洲的萨特。他曾长期旅居阿根廷，先后担任过阿根廷和乌拉圭几家杂志的主编。

家庭环境和自身的经历，使奥内蒂养成了非常孤僻的性格。他的这种性格特点有时也明显地反映在他塑造的人物身上。奥内蒂的作品，正如他本人所说，往往象螺丝一样，他只拧开一半，另一半要靠读者自己去拧。他的小说深刻反映了阿根廷、乌拉圭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不露声色地揭露了社会的弊病。他作品的独特风格给拉美文坛增添了异彩。

奥内蒂的主要作品有《无人的土地》（1941）、《井》（1943）、《这一夜》（1943）、《短暂的生命》（1950）、《无名氏墓》（1959）、《船坞》（1961）、《让清风谈话》（1979）等，《船坞》是他的代表作。1980年，他获得了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大奖。

《球星在情网中死去》（1954）是奥内蒂的著名中篇。1976年阿根廷卡利坎托出版社再版这本小说时介绍道：“看来，这是伟大的乌拉圭作家送给他忠诚的

读者们的一部最令人费解的小说。一个看上去已经抛弃红尘的男人，过早地过着空虚游荡的死亡生活；而活动在他周围的两个女人用她们神秘的、不同的感情，构成了这出爱情悲剧的主线。小说的情节是在好奇、似乎怀有在理的蔑视和瞬息而逝的同情心的第三者们面前展开的，而这些第三者的推断和猜疑，又借助这出悲剧、拉美小说的杰作《球星在情网中死去》的真实情节，给读者布上了一层虚假迷茫的烟幕。”

这篇译文是根据卡利坎托出版社1976年的单行本翻译的。



他第一次走进商店的时候，我只想看看他的双手。那双长手没有晒黑，动作缓慢而迟钝。颤颤抖抖，不由自主。当他似乎要指点什么时，马上为自己下意识的动作深感悔恨。他问了几句话，便站在柜台最阴暗的一角喝起了啤酒；他转过脸去，背对着凉鞋、日历和已经发白了的肉肠，面向西斜的太阳，紫色的山峦。他是在等候公共汽车去老旅馆。

的确，我只想看到他的双手。本来，在我把100比索零钱找给他时，看到他的双手就已经够了。他用手指紧捏着钞票，理齐，然后用力卷成扁团，小心翼翼地藏进上衣的口袋里。只看到他的双手如何在满是油垢和刀痕斑斑的柜台上动作，就足

以知道他的病是治不好的，我不知道他从何处获取了治愈康复的信念。

一般说来，对这种人，我只要看一眼就能明了八九，我还不记得我有弄错过的时候。不需要任何其它详情，只要看看他们提着箱子走进商店时的各种不同表情，是羞涩怯生，遮遮掩掩；还是兴致勃勃，大大方方。在得知镇上的医生加斯特罗或贡斯的看法以前我就能作出自己的结论。

护士是知道我不会弄错的；每当他来吃饭或玩纸牌的时候，总要我询问新来的病号，并且总少不了要嘲弄一番加斯特罗和贡斯。这也许是只想讨好奉承我，也许是真的尊重我。我在这个镇子上已经住了15年，就是从肺切除1/4那年起，在此地谋生也足有12个年头了。我自己也说不清我的判断为什么那样准确，但我知道，肯定不是因为我自己得过这种病。我观察他们，最多有时再听听他们的讲话就行了。护士大概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就连我自己也并不完全清楚：我为什么能猜测出他们谈话的内容，他们到我商店来买什么东西，并且将这两者加以比较。

当这一位乘公共汽车从城里来到我的商店时，护士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吃饭。我感觉到护士在用目光寻找我，想从我这里得到诊断结果。那个男人带着一个箱子和一件雨衣；他身材颇长，肩膀宽阔但有些弓缩；打招呼时毫无笑意，大概很长时间以来——从他得病的前几年开始——他的微笑就不吸引人了，那笑意不但毫无效果，而且适得其反。当他转身向着马路和高山喝啤酒时，我又看了他一眼；他在我眼底的柜台上理钱

时，我仔细观察了他的双手。可是，他没有付给我酒钱就离开了柜台，等酒喝到一半时，他才从那角落里慢慢吞吞、闪着并非傲慢的敌意目光、满腹忧虑地走过来向我付钱，他用那并不苍老，但不听支配，显得麻木的手指把找回的钱收起来，然后回去继续喝他的啤酒，那儿正好面对大街。他什么也不想看，只想离开我们，似乎我们这些身着衣裤、在春日黄昏的暗淡光线里几乎一动不动的人明光闪闪，比已经和黑沉沉的天空浑然成为一体的高山更难于从他的眼前抹掉。

“满腹忧虑的人。”如果护士能理解这话的含义，我一定会跟他这样说的。“满腹忧虑。”那天晚上，我一直独自重复着这句话。没有错，如果实话直说，确确实实是满腹忧虑。这种深刻的忧虑是他逐渐表现出来的。在这忧虑之中，孕育着一种毫无力量的绝望，而这绝望又很自然地与产生和滋长它的原因紧密相联。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望，并把这一绝望置之脑后。这并不是说他认为不能恢复健康，而是不相信治愈后有什么前途，有什么意义。

快40岁的样子，有时表现得那样懒散，说明他还没有成熟。当他离开商店去乘公共汽车时，护士的目光离开了我，端起酒杯，面向窗户。

“这人以后能活动，还是一命呜呼？如果他有病并去老旅馆的话，那将由贡斯接待他，我问问他吧。”

他用开玩笑的口气讲着，也许他在想办法给他注射针剂。我倒是很想坐下来和他一块喝杯酒，说说我看到的情况和我的猜测。时间我还是有的，因为上一班公共汽车没有下来任何旅

客，而且又是山上人在房子里开始做饭的时间。我很想和他聊聊，护士在对着酒菜微笑着，请我过去。但是，我没有离开柜台，在几个铁皮罐头上掸灰，连句话也没说。

“是的，他得了肺病，没错。但并不很严重，不是不可救药，不过，他好不了。”

“既然能治好，为什么好不了呢？是因为贡斯想把他宰了吗？”

我也笑了起来。话说起来很简单，他好不了，是因为治好与否已无关紧要。这样的病人，我和护士常常碰到。

我耸耸肩，继续掸我的铁皮罐头。

“我只是这样说说。”我说。

从那之后，我总是看到他从旅馆坐公共汽车到我店前，然后换车去城里。他几乎没有进过店，依旧穿着刚来时的那身衣服，总是打着领带，戴着礼帽。他与众不同，我是不会认错人的。他没有穿紧脚宽腿裤，没穿凉鞋，也没有其他人常穿用的衬衣和花色围巾。每次都是午饭以后来，一身首都人的装束，脸上还是那副孤寂的神情。尘土飞扬，天气冷暖，他全然不顾；怎样爱惜身体，他也毫不放在心上。他总是穿用那一套衣服，那一顶礼帽和那一双满是灰尘的鞋，为的是不给人留下生病和被隔离的印象。

我从护士那里得知，凡有火车开往首都的日子，他都要进城去发两封信。从邮局出来后，就坐到大教堂对面一家咖啡馆的窗台上喝啤酒。我想象得出他那时的样子：孤孤单单，无精打采，仰视着对面的教堂，就象在我的商店里凝视对面的高山

那样。他体会不到这些东西的存在有什么价值。他看着它们，想把它们从自己的视野里抹掉，想叫石头、圆柱和灰暗的阶梯改变形状。他用他那早已形成的固执性情，温情地说服他目睹的东西，让一切都能解释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绝望，解释他无意表露出来、或者虽然已经意识到然而已无法掩饰的不安心情。

为了不到我这个既是商店又是邮局的地方来发信，他每次得花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城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固执想法；这种想法不知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天真的戏法，要这种戏法只是为了证明他要去城里而不是在那里发信；按这一戏法的规定，效果比原因要重要无数倍，而原因又可以被改变、修正、遗忘。

他不是住在旅馆，也不是住在镇上，贡斯也不曾劝他去住疗养院；要是他不来我的商店发信，又不去城里邮局通过小窗口的橡皮垫把信送进信箱，这些事就无从说起了。如果他的信不象镇上其他人那样交到我的手里，而是去城里邮局亲自看看一只无名氏的手敏捷地在信封上打印邮戳的话，他的失踪也就不足为奇了。那只手藏在工作服的袖子里，看不到这个人的脸庞，也不知道哪一双眼睛能帮助他推断是谁在盖印邮戳。假如他看到邮戳敲击着信封，在表示姓名 首都或某个因事可以访问的城市名称的字迹旁盖上邮戳的话，那末，手啊，脸啊，眼睛啊，这一切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有时候他从城里回来时也到我店里来喝一瓶啤酒。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对他来说是失败的下午。所谓失败，就是

说他在信封上写下的女人名字辨认不清时，在那决定性的一刹那，邮戳突然举起，又象弹簧那样轻轻落下。这时，那名字变得毫无意义了，他便恶狠狠地、冷冰冰地看着橡皮垫。这使人意识到，他大概确实与收信人久别未见，他的体温一直很高。

我看着他斟满酒杯，默默地喝光；他把臂肘支在柜台上，侧身对着我。他尽量摆脱这样的想法：过去了的事情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即使那些最不灵敏的耳朵，也应该听到沙钟的细小沙粒每时每刻掉下的声音；这些沙粒掉下离去，变幻着，继续存在下去。他总是不喝醉就离开商店，步行返回旅馆。

但是，从首都给他寄来的信都要送到商店，落到我的手里。我让莱维家的男孩把信给他送去。这个孩子不在邮局领薪水，而是由旅馆、疗养院和我付给他钱。大概那男人以为我对寄信人及其境况十分感兴趣，会拆开信封，好奇地偷看别人在讲述同样一件事情时如何故作隐语，采用另外的表达方式。大概也因为这一点他才进城去发信。而且，也许由于心情急迫，没过几个星期，他就常常在每天中午前后，即在公共汽车司机刚把细长的、皱巴巴的邮袋扔给我之后，来我的商店了。

他毛遂自荐，从存放香肠和挂历的角落里走过来，找话题和我攀谈。他倒没有强行说服我相信他的话，也没有掩饰他对贵族姓氏不同拼写法的漠不关心。他彬彬有礼，要达到的唯一目的是让我记住他的姓名，省得总要问我是否有他的信。

最初，他每星期收到四五封来信。我很快就辨认出了哪些是情书，哪些是一般往来。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定期而来的同

一手迹的信。那是两种信封，一种用蓝墨水书写，另一种是打字机打的。他拿到信后，总是设法用敏捷的目光准确地扫一下，确定是谁写给他的，然后才放进口袋，回到那光线暗淡的角落，恢复先前的姿势，侧身对着满是蝇迹的民俗画和烟熏的年历，象往常收到信时一样平静，继续灌他的啤酒。

贡斯大夫已经嘱咐他不要过多活动，然而，只要口袋里装着打字机打的信封时，他便坐公共汽车而不是走路赶回旅馆。这并不是因为他急于回去看信，而是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在床上，双眼盯着天花板，或者一只手捏着信，或者信仍旧放在口袋里，或者放在桌子上3本书和从来没有用过的大水瓶旁边的绿色吸墨纸上，着魔似地在门窗之间独自踱步。他对盼望的事情既激动又恐惧。

他最关心的信有两种，一种是女人的蓝色手迹，字体粗圆，大写字母写得象音符一样，两个连写的“Z”都写成了“3”字。至于那些木色的、细长的、使他能遵照贡斯的嘱咐，拿到以后立即爬上公共汽车回旅馆的信，很明显，也是一个女人写来的，几乎总是在中间折了一道，是用一架破旧打字机打的，看得出字盘肮脏，凹凸不平。

已是仲春时节了，太阳时隐时现，没有一点活力；夜间寒意甚浓，而且还经常下点毫无益处的雨，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不安。护士每天背着装满细口瓶子的药箱到旅馆的楼上去，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不时地跟人们说几句笑话。旅馆的女仆经常下山来，到商店买旅馆需要的食品，或者购置香水、彩带之类不能拖到每礼拜进城一游时才采买的东西。她们一来，总要

谈论那个男人的事，因为过了好几个星期，尽管又来了不少客人，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个“新客”，护士也经常跟我说到他，这是因为他早就知道我对他感兴趣，而他又需要不断地讨好我。这位护士就住在我商店的汽车房里。他除了把针剂分送给病人，把钱存到城里的银行去，别无他事可做。他孤身一人，当寂寞令人难以忍受时，我们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为了在一起过得痛快，眼睛和耳朵从不消闲。我谈论他们，谈论别人，不谈自己。

人们经常到店里来聊天，我开始注意观察他了。高个子，宽肩膀，宽得有点奇特，步履缓慢但并非谨慎，在忸怩和傲慢两种特殊的表情中间保持着平衡。他总是独自一人在大厅靠近窗户的桌子上吃饭，把头扭向一边，面对冷漠无情的高山和阳光，以摆脱对自己的身世的回忆，避开周围的脸庞和容易引起回忆往事的谈话。

酒吧间的大厅里摆设着小桌子，上面罩着台布。我常看见他在那里耐着性子看书或读报，露出一副烦闷的表情。这个酒吧间每天向游人开放三四个小时。在那里，为了置身世外，他总是离游客远远的，离把这些人聚到一起的原因远远的，尽量表现得一无所思，把一切都抛到了脑后，他觉得这样心情更舒畅些。他无精打采地坐在稻草椅子上，直挺挺地伸着双腿，嘴角微微露出亲切的笑意。酒吧间里，时紧时慢、时长时短的脚步声，怪里怪气的叫喊，扑鼻的香味，他都不感兴趣。游客们沉浸在香气中，他们各有各的秘密，这秘密使他们象部落一样团结在一起，聚集在一起。

在每天的这两三个小时里，他置身于游客之中，可又独处一方，他觉得——装出觉得的样子——那忧虑已经扎了根，化成了一种模模糊糊的东西。对他来说，把确诊日期以前存在的一切都联在一起记录在案，是一出情节曲折的喜剧。

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否对他产生了好感，有时打牌的时候，我被“我大概永远不会理解他”的想法纠缠着。在旅馆的酒吧间里，他是个陌生人，背对楼梯旁平稳放着的磅秤——我敢保证他从来不曾使用过它。当人们爬上去看指针时，他对金属的响声和人们的议论置若罔闻。午饭前后，也就是他来到商店，一言不发地向我要他盼望的信件的前后，他一直在旅馆的周围溜达，甚至走到小河那边，在河床的白色卵石和石缝里流出的弯弯曲曲的小溪——那水闪着光，不停地流动着——旁观察和欣赏小桥的五根桥桩，然后穿过灌木丛，踏着红色的泥土，来到旅馆的垃圾坑，用鞋尖踢着坑里的纸箱、小瓶子、乱草叶、棉花和黄纸。

我每天中午都看到他穿着首都人穿的灰衣服，礼帽倾向颈背，走进商店；进店后便向我作短促的无声问候。当他口袋里装着来信——有时没有信——躲到角落里喝啤酒时，我注意观察他的眼睛，窥看他眼睛深处有没有愤怒或愤怒的流露。我看出那是一种用毅力控制着的不断加剧的怨恨。为了避开我，他扭过头去，看着刚刚收割完的土地和山间小道，看着在阳光照耀下的雪白房舍。

二

11月初的一个晚上，护士走进商店，一坐下就挑衅似地向我微笑着。我给他送去了酒、干酪和香肠，接着转过身，背对着他，一面拍打苍蝇，一面吹着口哨。

“难道您真的不知道？”护士终于开了口，“真是想不到，您记得那家伙吧？他好象要搬出旅馆。看样子闲话太多，他听厌烦了；或者他已经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因为有一天下午，他在花坛与戈麦斯夫人的金发姑娘们相遇时，跟她们打了招呼。不屑说，他把问安的话说错了，他平时就故意颠三倒四的，经常把午安说成早安，或者把晚安说成午安。那是想让别人都以为他心不在焉，说错了也不改，他是故意说错的。他想给人一种印象，他的心并没有放在他打招呼的这些人身上，连说话时是什么时辰都稀里糊涂。”

护士不时止住话，咀嚼着干酪和香肠，还常常边嚼边说。我突然想到，护士这样阴阳怪气，表现出强烈的憎恶情绪，不可能是因为那个人拒绝注射贡斯大夫开的针剂的缘故。这种厌恶情绪的根源，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侮辱，是一种暗中的诽谤。

“他准备离开旅馆。大概他说话太多，唾液都耗尽了，因为有一次他跟旅馆的伙计谈论下雨的事，问过女佣几点钟还可以喝到热水。不过，他还没有辞行，还没有凑足钱去结帐，也

还没有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开旅馆，如果有人愿意听他说明的话。现在谁也不跟他搭腔了，即使跟他说话，也只是拿他作笑料，验证一下他是不是会用他的脑袋，是不是用木板一样毫无表情的面孔，或睡鱼似的眼睛来回答人们‘是’或者‘不是’。”

为了让护士高兴，也为了表明我一直在听他说话，我微微一笑了一下，没向他提任何问题，继续用拍子打着苍蝇。

“说他的双眼象睡鱼的是那个高个子女佣雷娜。”护士承认说，“他还没有辞行，但是，有天午睡的时候，他没有跟往常那样去察看垃圾，而是爬上山去和安德拉德洽谈，租用葡萄牙姑娘们的那套房间。他对那套房间里发生过的事肯定一无所知。他不跟任何人说话，谁还会主动告诉他呢。”

“既然他已经病了，那也就没关系了。”我说。

“这还用得着您对我说？我并不是说怕传染。但不管怎么说，那套房间里死了姐妹3个，加上表妹就是4个人……而且，都是25岁上下死的。这真是奇事。”

“那不是费雷依拉姐妹的表妹，”我打着哈欠说，“再说，他也永远不会再有他的25岁了。”

仿佛我嘲弄了一个人似的，护士笑了起来。我一面关好百叶窗，一面想象着那个男人上山去打断安德拉德午睡时的情景：他懒洋洋地拖着修长而麻木，更确切地说，幽灵一样的躯壳，走进昏暗的房地产租用代办处，用低沉生硬的语调打听租用的可能性、价钱和建筑方面的各种细节。别人说什么他都信以为真，双眼迟钝地扫视着墙上的一张大而怪的山区平面图。为了标得清楚，在那张荒诞可笑的图上勾画出许多白色的粗

线，以代表尚未修筑的蜿蜒的街巷和林荫大道。那些红蓝线条标志着汽车将要通过的路线。以前，汽车从来没有爬山越岭，磨损轮胎，驶过这古怪离奇的地方。那男人仔细观察着平面图上花花绿绿的圆头钉，那是安德拉德用来表示别人委托他或出售或出租的房屋的大致方位的。他想从覆盖房屋的尘土里发现启示和允诺的火花。

安德拉德则汗流浹背，脸上挂着笑容，开始是谨慎小心的试探，接着是以满腔的热情，迫不及待地把葡萄牙姑娘们的4间一套的客房租让给他。房间里陈设的家具都用透明薄纱罩着，家具的花纹是姑娘们自己设计、由能工巧匠精心雕刻的。

那个男人决定租用费雷依拉姐妹的房子，这很奇怪。奇怪的不仅仅是他住进后还富余3个房间，也不只是他从走廊里只能看到他下午常去游逛的那些地方的景色：干枯的石子河床上架起的桥，旅馆的垃圾坑。

“您大概会以为这个人有钱租用这么多房间吧？”护士临去睡觉时这样问我，“可是，这还不包括安德拉德必然从中揩的油呢。”

然而，时隔不久，事实向我们表明他的钱多得很；山上的房子租用了好几个星期，可他仍旧住在旅馆里。只是每天下午，午饭后到天黑这段时间内，他才爬上山去，独自一人关在房间里，或呆在走廊里凝视着小桥和山脚之间被小河切开来的那块地方。

“谁跟您说他没有和某个葡萄牙姑娘相爱过？”护士议论道，“说不定就是跟二姑娘，因为她跟他一样健谈。一天，他